

辩证看待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

戴卫华

【内容提要】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聚焦于对新帝国主义的产生根源、经济基础、依靠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集中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当代新变化等问题。该理论重启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继承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资本批判精神与方法，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发展；探讨了人类社会解放和发展新的图景，并对左翼替代纲领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究其根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没有把资本批判的精神贯彻到底，以至于对反抗道路的探索陷入乌托邦的迷途。

【关键词】新帝国主义理论 经典帝国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西方左翼

作者简介：戴卫华（1977-），河南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0046）。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面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新帝国战略。与传统帝国主义主要依靠强制力量进行殖民扩张而控制世界不同，新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加温和，但却极具欺骗性和残酷性。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学者基于一贯的资本主义批判精神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

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引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潮流

新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和剥夺的方式是多样的，这些光怪陆离的方式和手段通常是在普世价值、贸易自由的掩盖下进行的。但是，如果揭开新帝国主义活动所披着的“普世价值”和“贸易自由”的外衣，就会发现其背后隐藏着经济和政治利益。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大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去剖析新帝国主义。

其一，政治经济学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的彰显，是时代主题变化的必然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个理论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以批评苏联模式为主要理论主题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对象。而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整个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表现为资本的全球流通、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和军事上的先发制人，这就使得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理论主题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经验材料，也必然使西方左翼学者以更强的使命感和理论兴趣去关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其未来发展。

其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的彰显，是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虽然起步于哲学，但是由于市民社会中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使他产生了“苦恼的疑问”，基于“苦恼的疑问”，他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

求”^①。《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②。《资本论》不仅仅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阿尔都塞等人就认为，“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真正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③。《资本论》体现出马克思的哲学反思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乳交融。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从日常生活维度去探讨资本主义大众生产和消费文化对个人的物化和奴役；另一个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动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析。而第二个维度，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的分析，是“我们面对的真正新颖的事件”^④。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其研究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哲学，而是扩张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诸多领域。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这些研究已经“越出他们前辈的哲学界线而转向更多地关心经济和政治理论”^⑤。尤其是在居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和英国，这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思想构建已蔚然成风。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正引领着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潮流，而对新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这一批判逻辑当代发展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和代表性成果。

二、资本批判精神下的新帝国主义理论

从马克思到列宁，从基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资本批判到针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然时代背景和批判对象发生了变化，但从未改变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奴役、剥削本质的批判精神。

1. 新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批判精神的坚持

在西方大多数学者为“历史的终结”而争论的理论大环境中，西方左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政治力量和理论流派显得尤其与众不同。

其一，对新帝国主义产生根源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大卫·哈维和埃伦·伍德等学者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去探索新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哈维的分析中，权力的资本逻辑体现的是资本为了追逐更多利润而进行的扩张，权力的领土逻辑是保证资本顺利扩张的暴力手段和机器，这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了新帝国主义进行剥夺性积累的两大利器，这两大利器又具体化为美国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国家政策。新帝国主义的剥削手段虽然较之传统帝国主义发生了变化，但剥削本质未变且剥削程度更深，而且，“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⑥。伍德认为，经济力量虽然超越了超经济力量而成为资本帝国对外扩张的主要推动力，“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⑦，但是超经济力量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共同实现对全球的控制和剥夺。尽管哈维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5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1页。

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④ [英]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臧峰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⑤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⑥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8—119页。

⑦ [加拿大]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和伍德对于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帝国主义不同发展时期所起作用理解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这些因素在根本上都是为了保证资本的权益，保证资产阶级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最大限度地去剥夺本国或他国的人民大众。

其二，对新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是批判性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学者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吸收不利导致经济停滞，为了遏制经济停滞而出现金融膨胀这一主线出发，提出了垄断金融资本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对这条分析主线上各要素的分析都是持批判立场的，经济剩余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资本从本国和外国人民那里攫取了过多的剩余价值；所采用的吸收剩余价值的手段如进一步扩大市场、保持足够大的军事开支等，也同样是建立在劳动者受剥夺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停滞期间，工人失业、福利取消，首先受到冲击的依然是广大民众。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体系的上层被牢固地控制在垄断金融资本家手里，下层则出现了大量的全球性劳动后备军。新帝国主义凭借对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秩序的控制，进行全球劳工套利并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榨取帝国主义租金。“帝国主义垄断租金是帝国主义对全部社会生产基础进行剥夺的代名词，其受益者是垄断金融寡头的财阀集团，其表现是对边缘地区的农民和当地自然资源的掠夺。”^①

其三，对新帝国主义国家和阶级作用的分析是批判性的。列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把国家理论引入到帝国主义理论中，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并非简单的是由资本的内在扩张性而自发形成的，而是国家政权有计划地保护和扶持的结果。他们指出，“美国可以僭越其他国家的主权对国际规则和规范进行干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正变为积极的‘帝国主义’”^②。尤其是面对第三世界所谓的“流氓国家”而采取的军事侵略和武装颠覆，导致了一个日益不加掩饰的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威廉·罗宾逊和莱斯利·斯克莱尔等学者把全球化时代下形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看作新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跨国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起跨国国际机器而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进行全面控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进行剥削，“阶级斗争正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风景”^③。

其四，对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也是批判性的。西方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从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的实践方案演变成新帝国主义统治征服世界的右翼意识形态。佩里·安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④。哈维也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武器来推动旨在建立美国霸权主义和统治地位的运动”^⑤。在新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先锋的掩护下，新帝国主义以全球化的名义击破了封闭国家的大门，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空间屏障，通过遍及全球的私有化浪潮为资本积累开辟广阔的空间。

2. 新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批判的不彻底性

虽然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但是他们不应把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而使危机暂时得到缓和的现实加以夸大，得出新帝国主义霸权仍然是牢不可破的结论，这显示了他们对新帝国主义霸权批判的不彻底性。

其一，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不恰当判断。大卫·哈维把剥夺性积累看作新帝国主义的核心特征和“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组织机构内部的首要矛盾”^⑥，用剥夺性积累代替了马克思

① Samir Amin, “Seize the Crisis!” *Monthly Review*, Volume 61, Issue 7, 2009.

②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p. 11.

③ Berch Berberoglu,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 129.

④ 转引自周德明：《当前西方左翼的新自由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

⑤ [美] 乔万尼·阿瑞吉等：《新自由主义的性质和前途》，丁骥千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6期。

⑥ [英]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的生产性积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换为中心国家从事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跨国资本家和边缘国家的被剥夺民众的矛盾。哈维的这一结论无意中就遮掩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无形中用因剥夺性积累而产生的跨国资本和被剥夺民众的矛盾转移了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视线。

其二,对新帝国主义霸权稳定性的乐观粉饰。列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把新帝国主义只看作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国家关系领域的一种政策,因而就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对帝国主义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他们看来,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了国际性的权力中心和调节机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互相渗透、彼此联系的格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不会存在很大可能,全球资本主义在美国的霸权维持下将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威廉·罗宾逊等也认为,“由于资本和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世界范围的冲突也不再以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为基础”^①。这种看法无疑是对新帝国主义霸权的一种粉饰,和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霸权发展趋势的分析是背道而驰的。

三、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批判方法的继承与修正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的变化必然要求理论也要不断创新,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实。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②。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正是帝国主义现实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也是传承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

1. 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资本批判方法的继承

在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都被作为重要的方法工具去分析帝国主义的形成基础、本质属性及历史趋势。同样,在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中,这些方法也被学者们自觉地继承下来并加以运用。

其一,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资本批判方法的继承。大卫·哈维把资本逻辑看作主导新帝国主义扩张的主导性逻辑,运用的是从经济基础来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他关于资本通过“时间—空间修复”方式来缓解资本剩余危机的过程的分析,也体现了资本运动的历史生成过程。埃伦·伍德同样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去考察新帝国主义,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认为新帝国主义区别于历史上不同类型帝国的根本之处在于经济力量在其运行机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另外,伍德还继承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去分析帝国主义的做法,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进程角度,对新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分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从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剩余导致经济停滞,为缓解剩余危机和经济停滞而导致金融膨胀,并形成垄断金融资本这一逻辑出发,把垄断金融资本视为新帝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其二,对以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工具的资本批判方法的继承。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把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与基本范畴灵活地应用到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批判中去。

^① Roger Burbach and William I. Robinson, “The Fin De Siecle Debate: Globalization as Epochal Shift”, *Science & Society*, Vol. 63, No. 1, 1999.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比如，列宁曾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帝国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垄断、生产力的发展和腐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垂死等；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分析帝国主义的历史走向，其所包含的否定的因素决定了其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的考察也充分体现出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比如，哈维和伍德把矛盾分析法应用于对新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考察。他们把经济与政治作为新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又按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原理，把经济力量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政治力量视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新帝国主义区别于传统帝国的根本之处在于资本逻辑或经济力量在帝国主义的矛盾统一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着新帝国主义未来的发展。福斯特等学者运用普遍联系观点及原因与结果这一对辩证法基本范畴分析垄断金融资本。在他们看来，经济剩余、经济停滞、金融扩张和垄断金融资本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这张联系之网既是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又是决定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神秘咒语。而且，这些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要素又存在着因果关系，经济剩余导致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导致金融扩张，金融扩张又导致垄断金融资本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对原因与结果这一对范畴的应用，才使他们找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症结的原因。

2. 个别理论是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资本批判方法的修正

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在总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思路，也借鉴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方法，但就个别理论分析而言，依然存在着违背或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事实。

其一，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认为，在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全球流动的地理学景观下，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仅仅拘泥于时间维度，以历史的客观规律替代历史生动的发展过程，进而把资本主义视为静止封闭的结构，把时间物化为绝对的空间，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宣判，不但不能完成历史发展提出的任务，也会在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夹击下日益丧失话语权。因此，“构建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理的理论化框架”，“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接近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联合帝国主义战争问题”^①是时代所需，而建立这样的理论需要把资本积累历史进程和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结合起来，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指导下，哈维从新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出发，揭示了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时空中的辩证运动，为缓解资本盈余危机而采取的“时间—空间修复”，以及建立在全球地理空间扩张基础上的剥夺性积累等一系列新帝国主义问题。

但是，由于哈维过分地强调空间地理在分析新帝国主义运行机制中的作用，对时间历史的作用估计不足并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这是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的修正。首先，从空间扩张这一普遍特征出发去分析帝国主义，至多认识到了新帝国主义基于空间扩张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其次，虽然对当下新帝国主义的空间地理不平衡发展、资本积累及其处理危机的方式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分析，但由于过分强调空间扩张在新帝国主义霸权中的作用，也就限制了从更长远的视角去探讨新帝国主义历史结局的反思深度，对新帝国主义发展趋势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新帝国主义将转向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从而陷入考茨基的“超级帝国主义”的窠臼，看不到新帝国主义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其二，以消费和流通遮蔽生产，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巴兰、斯威齐和福斯特认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 17.

为，在个别垄断企业和组织控制核心工业和整个经济，并导致竞争受到限制的垄断资本主义环境下，会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剩余。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顺利进行，必须采取多种方式吸收经济剩余，这些方式包括销售努力、政府的民用支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膨胀的金融资本等。但抵消力量和经济剩余的产生始终是不对等的，经济剩余就像滚雪球一样时刻威胁着资本主义经济，使其陷入停滞的常态。然而，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过分看重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与从生产领域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是相偏离的。首先，他们把经济剩余主要归因于分配不合理而造成的“消费不足”，这就重蹈了霍布森、卢森堡等帝国主义论者错误的覆辙。虽然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停滞并推动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原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毕竟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一个方面夸大为整体，把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夸大为最根本的或唯一的原因，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其次，用“经济剩余”来代替“剩余价值”，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来代替利润率下降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以生产为中心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方法。最后，他们把经济的金融化和垄断金融资本的产生看作经济停滞所导致的，是过度积累的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的结果，是过度地强调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其三，以国家理论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所谓“经济还原论”进行修正。帕尼奇和金丁认为，传统帝国主义理论过分强调经济和资本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从而犯了经济还原主义的错误。他们把国家理论引入到帝国主义的动力学之中，认为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利坚帝国，都说明了国家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他们从国家的视角去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充分肯定国家在帝国主义实践中的作用，对于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研究帝国主义而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视角。

但是，帕尼奇和金丁指责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是经济还原论和经济决定论，并把国家理论植入到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中，试图实现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是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的修正。首先，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思维模式。恩格斯就曾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其次，列宁只讨论了帝国主义扩张的经济学而回避了讨论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政治方面，主要是为了通过当时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序言中如是说：“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理论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②最后，帕尼奇和金丁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资本主义属于生产关系和经济领域，帝国主义属于国家关系领域，反对把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一个特定发展阶段，认为帝国主义纯粹是独立于经济利益的政治问题，这也违背了以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分析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必然只是流于对新帝国主义外在表现的观察，而不能把握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动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

四、反抗霸权道路的探索与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愿景

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试图构建左翼替代纲领，为全世界人民反霸权寻求可行之路。

1. 对反抗道路的积极探索

新帝国主义逐渐走向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西方左翼的共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单靠“坐等”帝国主义的灭亡是不现实的，必须把广大受剥削的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其一，新帝国主义霸权是全世界广大民众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全球范围进行联合斗争，才是可行且正确的道路。大卫·哈维认为，应该把反对新帝国主义的斗争置于全球范围内，并把各种形式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哈维强调，针对剥夺性积累的反抗和无产阶级斗争是有机地结合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内部的，如果过分强调一方而完全忽视另一方，就会不仅会削弱马克思主义者反抗的力量，也会削弱其分析和做出计划的能力。因此，要想增强反抗的力量并取得预期的成果，必须把二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扩大再生产内部的斗争和反抗剥夺性积累的斗争之间的连通性必须得到辛勤的培育”^①。威廉·罗宾逊同样认为反抗斗争需要全球联合。他指出，如果斗争仅仅限于本土或者几个受压迫的孤立点，没有将斗争转向更大的规模，斗争想要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反抗运动和对立性霸权，其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运动和大众力量能否跨越国界联合斗争。”^②而全球化也为这种斗争创造了条件，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斗争场所，本土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可能通过跨国联盟相互联系起来。福斯特也认为，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的最大希望依然是全球各地出现的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但是这种反抗运动不应是分散的，而是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全球民众都动员和组织起来，使整个反抗运动变得更加国际化和组织化。他认为，马克思在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唯一可行的：“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③一个新国际的成立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萨米尔·阿明同样呼吁建立新的国际去对抗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国际需要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人民创新出一种真正的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决裂的左翼文化；需要处于资本主义外围的人民破除对全球化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幻象，并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寻求最佳的方案；需要人们重新创造有效的、适当的组织和政治行动模式，以对抗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权力网络。

其二，全球范围的反抗运动也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参与。有的学者更看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斗争在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中的重要性，比如埃伦·伍德。伍德在充分肯定经济力量在新帝国主义中的主导性作用的同时，还一再强调了新帝国主义对超经济力量及国家力量的依赖，在涉及如何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这个问题上，她依然持同样的观点。伍德指出，反新帝国主义的实质不在于反对作为新帝国主义全球统治工具的跨国组织，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伍德反对反抗运动多元化的目标和松散的联盟及其与工会、政党保持距离的做法，认为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等概念依然应当被坚持，国家和国家内部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依然是反抗新帝国主义的最关键的场所和最有力的主体，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斗争不但不能放弃，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

① [英]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② [美] 威廉·I. 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页。

总之，在阶级斗争理论式微的今天，西方左翼针对新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提出了较为切实的反抗路径，为陷入后现代主义迷雾的反抗形式如何走出困境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2. 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愿景

由于西方左翼部分学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道路，丧失了对新帝国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把握，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找不到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的真正依靠力量，也就注定了他们提出的反抗方案和策略只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革命愿景。

其一，由于西方左翼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道路坚持到底，没有把握住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就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新帝国主义虽然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论断依然有效。而在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矛盾的分析中，要么偏离了这一主题，要么与之背道而驰，其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没有针对性。比如帕尼奇和金丁把新帝国主义看作独立于经济之外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是截然分开的，所以，导致新帝国主义危机的不是经济上的崩溃，而是新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并把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看作反抗其霸权的绝好机会。因此，在他们看来，斗争的目标应该是针对新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行为，也就是说，要针对新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展开斗争。这种策略看不到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其二，反抗新帝国主义霸权所依靠的力量过于多元化，容易导致实际反抗斗争中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甚至被敌人从内部进行瓦解。西方左翼大都认为应该在全球范围进行联合斗争，这个反抗的总体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在设想把全球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的同时，并没有为反抗道路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力量。“斗争主题的分散与组织中心的缺失，是目前反抗运动的主要问题。”^①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新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是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地联合起来的，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具体利益的特殊性，以及反抗组织之间的相互隔阂甚至矛盾冲突，将会使反抗运动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在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控制下，有着被内部分化的危险。

其三，西方左翼不能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甚至从未真正地走向反抗斗争的第一线。西方左翼学者大都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他们的思想是激进的和反资本主义的，但是由于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淫至深，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魔咒。他们在基本立场上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实际上起到了使该制度完善化的作用。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旧框架中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性问题的”^②，他们所提出来的反抗策略也不会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这些左翼学者大都只是躲在书斋里低声诉说着全球解放逻辑，他们至多是全球反抗运动的旁观者、同路人，却很少是实际上的参与者，更毋提组织者了。

其四，由于他们找不到反抗霸权的有效策略和所依靠的力量，以及他们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注定了其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展望充斥着乌托邦式的空想。比如，虽然罗宾逊也含糊地声称同意马克思的说法要取缔资本主义，但他又认为“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

① 金梦：《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西方左翼的反抗——从2017年纽约左翼论坛看西方左翼思想发展新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② 陈江生：《西方左翼思潮为何陷入停滞》，《人民论坛》2018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①。这种设想看起来很美好，但由于不触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谓普遍的民主、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这些构想也注定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哈维在阐述反抗革命的替代性构想时，认为新帝国主义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某种形式的“新政”，新帝国主义霸权将由现在的赤裸裸的剥夺转向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哈维还认为这种“新政”帝国主义可以通过考茨基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而得以实现。这种观点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只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主观臆想，是注定无法实现的政治乌托邦。

五、结 论

对于西方左翼新帝国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坚持如下看法：其一，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应该是总体性的批判。新帝国主义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不同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因此，对新帝国主义的考察不能拘泥于某一个方面。西方左翼学者大都是基于自己的学术专长侧重于从某个视角对新帝国主义进行考察，这虽然从特定的视角揭示了新帝国主义，但对新帝国主义的总体性考察却略显不足。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考察批判的基本方法，对于分析新帝国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传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对新帝国主义进行考察批判应该立足于导致帝国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充分兼顾到国际政治发展、文化意识形态变迁等多种要素在新帝国主义霸权中的影响和作用。

其二，要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分析新帝国主义。西方左翼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和修正，导致了对新帝国主义的分析结果与社会发展现实之间出现偏差。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新帝国主义，根据“两个必然”的科学判断，就会认识到新帝国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存在有历史必然性，但随着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种种矛盾的发展，也注定了新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同时，我们对其走向灭亡的过程又要有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两个绝不会”的科学判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②

其三，对新帝国主义的考察要坚持彻底的批判精神。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所以不彻底，究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批判勇气，也并非他们的批判言辞不够尖锐，而在于他们大多没有抓住或者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即没有从根本上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这一根本矛盾，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只是以其他非根本的、非主要的矛盾来代替。因此，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应该坚持矛盾分析法，把“重点论”和“两点论”结合起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他非根本矛盾或非主要矛盾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新帝国主义进行科学而彻底的分析与批判。

其四，对新帝国主义的考察应具有全球视野。西方左翼学者大都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限制决定了他们的批判大多只是聚焦于新帝国主义国家本身，难免有“西方

① [美]威廉·I. 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页。

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要坚持用全球视野去考察新帝国主义，把新帝国主义霸权和被剥削国家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以因推果，以果究因，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新帝国主义，并探寻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参考文献：

- [1] [英]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 [英] 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陆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
- [3] [埃及] 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三大洲的使命》，于海青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
- [4] 张剑：《2015年国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览》，《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1期。
- [5] 杨素群：《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编辑：张 剑)

(上接第12页)有效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制度，等等。这是中国人民经历了100多年奋斗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繁荣进步，全体人民不断迈向幸福美好生活的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指出了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路径，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摸索试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到的认识，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努力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实现十九大提出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编辑：黄华德)